

庐山国学师生考

李 全 德

一

书院教育自宋代以后无疑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形态之一,李弘祺先生即称书院讲学是近千年来中国私家讲学的惟一显著的制度^①。当今学界关于书院的研究尤其是在其规制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②,但在关于书院起源的问题上则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建于南唐时期的庐山国学,是五代十国教育史上最大的亮点,也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史上的一大标志性事件;它作为宋初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被很多学者看作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起源^③,但同时又有学者则根本就不认同它是书院^④。尽管对于庐山国学的性质有多种认定,却很少是建立在对庐山国学的较为细致的研究基础之上^⑤。由于现在有关庐山国学的资料绝大部分来自于对其教师与学生的记载,因此本文主要在于考证庐山国学的师生情况,廓清一些相沿已久的错误认识,关于庐山国学的性质及其与早期书院的关系将另文讨论。

二

庐山国学建立于南唐升元年间(937-943),至宋开宝八年(975)南唐亡,共存在了三十多年^⑥。据马令《南唐书》,南唐金陵国

子监与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李善道为庐山国学首任主教时，“学徒数百人，皆为时望。”^⑦到开宝中，朱弼知庐山国学时，仍有“生徒数百。”可见庐山国学的生员当总是保持数百人以上。三十年间，曾在庐山国学任教、就学的师生当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但现在绝大多数人的事迹都已湮没无闻，可考者惟数十人而已，这仅存的数十人的资料构成了我们了解庐山国学的基础。

前辈学者如盛朗西、严耕望等对于庐山国学的师生都有一些论述，李才栋先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共考证出曾在庐山国学任教的有李善道、朱弼、陈颙、刘元亨以及毛炳等五人；曾在庐山国学就读的生徒有李中、刘钧、杨徽之、孟贯、刘式、江为、伍乔、刘洞、卢绛、蒯鰲、诸葛涛、魏羽、李寅、李续、孟归唐、何昼、王俨、夏宝松、许坚、黄载、彭会、罗颖、殷鹄等二十三人^⑧。但是在这个二十八人的名单中，倒有十二人的身份是值得商榷的。李才栋先生对于所考出的生徒，多数没有注明史料来源，故以下仅就笔者所见资料，对此十二人的身份做逐一讨论。

陈颙、江为、刘洞、夏宝松。

江为、刘洞俱曾学诗于陈颙，夏宝松又学诗于江为，故此四人有传承关系，因而，一旦视陈颙为庐山国学教师，则其余三人自然便被认做是国学生了。此四人马令《南唐书》均有传：

陈颙，南闽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进，一卧庐山三十年，学者多师事焉。元宗以币致之，布裘鹿鞞，进止闲肆，因献《景阳台怀古诗》云：“景阳六朝地，运极自依依，一会皆同是，到头谁论非。酒浓沉远虑，花好失前机，见此尤宜戒，正当家国肥。”元宗称善，欲授以官，颙固不受，赐粟帛，遣还旧隐，卒年七十^⑨。

江为，其先宋州人，避乱建阳，遂为建阳人。游庐山白鹿洞，师事处士陈颙，居二十年，有风人之体。时金陵初复唐制，以进士取人。为有《题白鹿寺》诗云：“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

家玳瑁筵。”元宗南迁，驻于寺，见其诗，称善久之。为由是傲肆，自谓俯拾青紫，乃诣金陵求举，屡黜于有司，为快快不能自己，欲束书亡越，而会同谋者上变，按得其状，伏罪^⑩。

刘洞，庐陵人也。少游庐山，学诗于陈贶。精思不懈，至泱日不盥。贶卒，犹居二十年。诗长于五言，自号五言金城。后主即位，诣金陵献诗百篇，后主览其首篇《石城怀古》云：“石城古岸头，一望思悠悠。几许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后主掩卷为之改容，不复读其余者。洞羁旅二年，俟召不报，遂还庐陵，与同门夏宝松相善。陈贶尝谓己诗埒贾岛，洞亦自言有浪仙之体，恨不得与之同时言诗也。虔州陈德诚尤重其词学。……开宝八年(975)卒，其遗集行于世^⑪。

夏宝松，庐陵吉阳人也。少学诗于建阳江为。为羁旅卧病，宝松躬尝药餌，夜不解带，为德之。与处数年，终就其业，与诗人刘洞俱显名于当世。……晚进儒生求为师事者，多赍金帛不远数百里辐辏其门。宝松黻货，每授弟子，未尝会讲，唯赍帛稍厚者背众与议，而给曰：“诗之旨诀，我有一葫芦儿授之，将待价。”由是多私赂焉^⑫。

从马令的记载来看，陈贶只是避世庐山不求闻达的一个隐士。元宗李璟闻名征召，欲使之弃隐从官，陈贶不受，故而李璟又“遣还旧隐”。陈贶从来就未曾入仕，又怎么可能是庐山国学的学官呢？龙衮《江南野史》亦有《陈贶传》，记陈贶隐逸事尤详，恰可与马令的记载相互参照，其传云：

处士陈贶者，闽中人。少孤贫好学，游庐山，刻苦进修，诗书蓄数千卷，有诗名，闻于四方。慵于取仕，隐于山麓，岁时伏腊，庆吊人事，都不暂往，时辈多师事之。有诗数百首，务强骨鲠，超出常态，颇有闽仙之致，脍炙人口。……其《咏景阳台怀古》有云：“景阳六朝地，运极自依依。一会皆同是，到头谁论非。酒浓沉远虑，花好失前机。见此尤宜戒，正当家国肥。”嗣

主闻之，以币帛征之，乃幞巾绦带，布裘鹿鞞，引见宴语，因授以官，赋苦辞不受，嗣主见其言语朴野，翔集疏远，不却其志，因锡以粟帛，放还旧居，又十余年而卒，时及七十矣^⑬。

陈颙隐居庐山三十年，聚书千卷，又有诗名，因此，“学者多师事焉”，江为、刘洞即是先后从陈氏学诗，所以也都不是国学生。刘洞后主时因献诗不得志，又归隐庐山，“与同门夏宝松相善，为唱和俦侣。”^⑭因夏宝松学诗于江为，故刘洞视之为“同门”，而据《夏宝松传》，夏从江为学诗出名后，就做了以授诗为业的私学教师，李才栋先生竟将之与江为一起列入国学生，尤不可解。

马令所作《江为传》中有江为游白鹿洞，师事陈颙学诗以及题诗白鹿寺的记载^⑮，这是江为被众多学者看作是庐山国学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⑯。如上所述，陈颙决不可能是庐山国学教师，但如何理解江为在白鹿洞学诗于陈颙并有题诗在白鹿寺或白鹿国庠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对陈颙等师徒所涉及的几个关键的年代做大致的推测，推测的依据均出自《马氏南唐书》以及《江南野史》各本传。

刘洞卒于开宝八年(975)。刘洞在陈颙卒后，“犹居二十年”，则陈颙卒年不会晚于李璟保大十三年(955)；陈颙卒年七十，则其生年大致在唐懿宗光启元年(885)。陈颙隐居庐山三十年，所以其隐居庐山的时间可能是在吴顺义时期(921-926)。从陈颙《景阳台怀古诗》中“见此尤宜戒，正当家国肥”一句看，元宗征召陈颙可能是在其即位不久的保大初年，正当南唐鼎盛之时，故诗中蕴含劝戒之意。而从保大二年(944)年底之后，元宗不能守成，南唐接连陷于闽、楚之役，国势日蹙；此后十余年陈颙卒，正是保大末年，这也与我们前面推测的陈颙的生卒年大致相符^⑰。据陈尚君先生考证，江为生年大约在后梁(907-923)前期^⑱；江为从陈颙学诗，居二十年，则学诗的时间最晚也不会晚于后唐清泰二年即吴天祚元年(935)，这时候，江为当在三十岁左右，南唐则还没有建立。

庐山国学建立于南唐升元中期以后,也就是说,在庐山国学建立的时候,陈颙在庐山隐居已经差不多二十年。笔者推测,在庐山国学建立之前的二十年间,陈颙很可能就是在白鹿洞隐居教授的。实际上,白鹿洞一直是“有名无洞”^{①9},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在庐山国学建立之前就一直是私人讲学的胜地,荟萃了众多学者。陈颙之外,颜真卿的后裔颜翊即曾率子弟二十余人,授经于白鹿洞^{②0}。所以,在庐山国学建立之前,江为就已经追随陈颙学诗,其题诗壁上也是在这个时间,我们并不能因为后来的庐山国学有某人的题诗,就断定其人就是庐山国学生。

刘元亨、黄载。

刘元亨与黄载亦是师徒关系。黄载,马令《南唐书》有传:

黄载,字符吉,其先江夏人,世为农。载弱冠释耒耜,就学于庐山,事虔人刘元亨,笃志自励,精究经史,能为文章。一举不中第,叹曰:“士之贱也久矣,规模于蹇浅之文,去取于有司之手,其于造道不亦远哉?”遂不复进取。肄业之士多从之。事母至谨,承颜侍膳,温凊寝处,未始离左右,兄弟数人,皆仰载费给。或勉之就仕,则曰:“天下分裂,终合为一,一系仕版,死生以之,宁适意乎?”及金陵平,禄食之家多俘于京师,而载乃安处丘园,人皆以为先知^{②1}。

仅从这段记载看,我们没有理由将黄载就学于庐山看作就是就学于庐山国学。

关于刘元亨的记载现在主要见于方志。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三《姓氏志》云:“刘元亨,字子嘉,南康人。读书白鹿洞,有操行,弟子礼事之。”^{②2}仅仅是几十年后,到了嘉靖年间郑廷鹄所做《白鹿洞志》的时候,就有了刘元亨“祀先贤祠”的记载,同时,刘元亨开始被称之为“宋白鹿洞洞师刘公”^{②3},其后的各种白鹿洞志都沿袭郑说。到了清代修《江西通志》,关于刘元亨的记载又添新内容:“刘元亨,字子嘉,南康人。开宝中入白鹿洞修进士业,江南国学

废，例选赴阙，以学行老成为后辈推重。复还乡，道过庐陵，郡守闻其名，荐应举，登咸平二年第。”^{②4}庐山国学最后一任主教朱弼在建康平定后，“例入京师，授衡山簿”^{②5}，《江西通志》说刘元亨“江南国学废，例选赴阙”，显然是将刘当作庐山国学的学官看待了。综合以上的种种记载，里面有诸多矛盾处：刘元亨就读于庐山国学，又任教于庐山国学；既是南唐庐山国学学官，又是宋初白鹿洞洞师。对此，李才栋先生有一个解释：“刘元亨开宝中入庐山国学，以其博学、仪行为诸生师。赵宋有江南，国学废。江州士民在国学旧基建白鹿洞书院，刘被推举为主洞。”^{②6}以上各家记载中，越是后出者，越多人为增饰的痕迹。刘元亨为了应举而读书白鹿洞，所谓“例选赴阙”云云，宋人无载，现存最早的李梦阳的《白鹿洞书院新志》亦不载，故根本就不可信。相比之下，还是以李梦阳所说的“读书白鹿洞，有操行，弟子礼事之”最为平实可靠。也就是说，刘元亨应该是庐山国学生，而不应是教师，只是可能由于他有操行，学识又在众人上，故而为当时国学的其他学生所推重而“礼事之”，像对待老师那样对待他，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教师。

刘元亨既然不是庐山国学的教师，黄载学于刘元亨当然也不必就是国学生。从马令《黄载传》看，黄载在北宋平江南之前也就是国学废之前就已经是“不复进取，肄业之士多从之”了，是私学教师而不是国学生。

毛炳、彭会、罗颖。

毛炳、罗颖两人《马氏南唐书》俱有传，彭会仅见于此两人传中。《毛炳传》：

毛炳，丰城人也。好学不能自给，因随里人入庐山，每与诸生曲讲，苟获费镗，即市酒尽醉。时彭会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说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升。”炳闻之，小哂而已……后聚生徒数十讲诵于南台山，迨数年，自署于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载只空山。”因大醉，一夕卒^{②7}。

严耕望先生早在《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中已引用马书《毛炳传》，并有按语云“此当即在庐山国学”，视毛炳为国学教师。但从毛炳在庐山“每与诸生曲讲”这样的记载看，根本得不出他是国学教师这样的结论。实际上，他不过是庐山上众多的私人讲学者之一，通过为学者讲经获取束修以维持生计，这和前面提到的夏宝松讲诗，同传中提到的彭会说赋都是一样的性质。毛炳先是讲学庐山，后又在福建南台山聚徒，不正说明了其私人讲学者的身份吗？所以马令将之于陈颙等并入《隐者传》，陆游《南唐书》本传也称其为“隐居庐山”而不是仕于国学^②。

马令《罗颖传》是关于罗颖的最早、最主要的记载：

罗颖，南昌人也。经传涉猎，与里人彭会友善，皆以词赋称。开宝中诣金陵，举进士第，例以黄衣守选。及王师问罪，后主銜璧，颖再应乡举，下第……数日卒^③。

从中我们丝毫看不出他有读书庐山国学的迹象。

许坚、魏羽、李续。

许坚，南唐郑文宝《江南余载》有传云：

许坚，往来句曲庐阜之间，草装布囊，或卧于野，或和衣浴涧中，萧然不接人事，独笑独吟而已。其诗有云：“只应天上路，不为下方开。道既学不得，仙从何处来？”……坚诗颇多，其语意类此。景德中无疾卒于金陵，岁余忽于洪州谒见兵部员外郎陈靖。靖至建康，言之王化基，发其墓，已尸解去^④。

许坚亦入马书《隐者传》：

许坚，不知其家世，或曰晋长史穆之裔。形陋而怖，或寓庐阜白鹿洞，桑门道馆，行吟自若……后或居茅山，或入九华，适意往返，人不能测。^⑤

而且关于许坚的许多记载大都语涉怪异，在宋阮阅《诗话总龟》中，许坚便是既入《隐逸门》，又入《神仙门》^⑥。由此看来，许坚实在是真隐士一流的人物，庐山只不过是其隐居地之一而已，我们不能因

为其传中有“寓庐阜白鹿洞”这样的字眼，便臆测其为就读于庐山国学，实际上，他不但不是庐山国学生，甚至也谈不上是一个士人。

魏羽与李续的情况与许坚颇相类似。魏羽，亦见于郑文宝《江南余载》：

魏羽肄业于白鹿洞，临赴举，大醉卧百花峰下，稍醒，忽有鬼物十数辈环侍其侧。羽惊问之，对曰：“以公贵人，故奉守耳。”其后羽以昭文馆校书起家，过江，至三司使、工部侍郎^③。

李续，《江西通志》有记载：

李续（一作绩）字继宗，永新人。少不事生产，专志儒业，尝读书庐山，学成游建业，会宋师南攻丹阳，润州节度使卢绛辟掌记，授宣教郎。江南既入宋，隐居不出，教授乡党。郡倅温仲舒、向敏中慕其贤，皆劝之仕，终不起，年九十余卒^④。

此二人一肄业于白鹿洞，一读书于庐山，仅仅根据这样的记载，便断言他们必定是读书于庐山国学，仍嫌证据不足。

庐山自唐末起就成为山林习业的中心，类似于李续这样的记载实在是太多。曾做到南唐枢密副使的李征古，也是因为曾在庐山读书，而同样被有的研究者看作是庐山国学生^⑤。李征古作有《庐江宴集记》，记载其当年在庐山读书的经历：

乾贞己酉岁，予旅游及此，得国朝四门博士庭筠书堂故基……予方肄业，乃结庐而止。俄尔，长乐从弟兄泊亲友十余人继至。明年，予倚金印峰，复营小堂以自居。游焉息焉，无复四方之志^⑥。

李征古显然是一个游学庐山并结庐而居的山林习业者，他所建的书堂即是其个人读书处。

三

综上所述，李才栋先生所考庐山国学师生二十八人中，以上十二人的教师或学生身份都是不可靠的。剩下的十七人中，根据

现有资料，我们能够确定的庐山国学教师有李善道^{③⑦}、朱弼^{③⑧}两人；庐山国学生则有李中、刘钧^{③⑨}、杨徽之^{④⑩}、孟贯^{④⑪}、刘式^{④⑫}、刘元亨、伍乔^{④⑬}、卢绛^{④⑭}、蒯鰲^{④⑮}、诸葛涛^{④⑯}、何昼^{④⑰}、殷鹄、王俨、李寅^{④⑱}、孟归唐^{④⑲}等十五人。史籍中关于这些人身份的记载，都甚为明晰，故本文不再详论。此名单之外，杨徽之的堂弟杨参也同杨徽之一起读书于庐山国学^⑤，这样现在可考的庐山国学生共有十六人。

严耕望先生在其名作《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中指出，宋代书院即渊源于唐代士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不但其性质由此风尚演进而来，即“书院”之名称亦由此种风尚中所形成。实际上不惟宋代书院，即庐山国学亦是在士子习业山林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朱熹所言：“自升元之有士，始变塾而为庠；俨衣冠与弦诵，纷济济而洋洋”^⑥，由一私人读书处发展成为一官办学校。明此一节，则我们在判断庐山国学师生的时候，自当将就读于庐山或庐山国学的前身白鹿洞与就读于庐山国学区别开来。以上所考诸人之所以会被误会为庐山国学师生，主要原因正在于对此一点不加细察，望文生义而致误。当我们将之一一排除在庐山国学师生之外时，他们所代表的另外一种引人关注的教育现象也就凸现出来，这就是十国时期山林讲学与习业山林风气之盛。

注：

①李弘祺：《绛帐遗风——私人讲学的传统》，林庆彰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浩瀚的学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修订版，第385页。

②1997年以前的书院研究状况可以参看王炳照：《书院研究的回顾与瞻望》，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6页；1997年以后综论书院制度的主要有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樊克政《书院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等。

③书院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中唐以后说，以朱熹、王昶、陈东原、李才栋为代表；一是五代说，以周予同、盛朗西、章柳泉为代表；一是北宋说，

以洪迈、王夫之为代表。可参见杨布生、彭定国编著《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④参见李才栋：《唐代书院的创建与功能》，《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⑤笔者寓目所及，仅有李才栋先生对庐山国学的教师与生徒做过较为详细的考证，参见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7页。

⑥关于庐山国学建立的时间，清以前的史籍如两《南唐书》、《庐山记》、《玉海》以及明代李梦阳等所修诸种白鹿洞书院志等皆记载为升元中，具体何年不详，至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始系于升元四年(940)，不知其何所据，颇疑是吴氏据“升元中”，中分升元时期的六年，臆断而成。南唐李中有《壬申岁承命之任淦阳再过庐山国学感旧寄刘钧明府》(《全唐诗》第21册，8546页)一诗，首句为“三十年前共苦辛”。严耕望先生在《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引用，并有按语云：“壬申为梁乾化二年，三十年前当唐僖宗中和中，时尚未建国学。”严先生显然是疏忽了开宝五年(972)亦是壬申岁，由此前推三十年，为942年(升元六年)，但此为升元末，不一定就是庐山国学的建立之年。

⑦《江西通志》卷64《名宦八》“李善道”条，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第22-25页。殷鹄当为段鹄之误，同氏著《江西古代书院研究》中已改正，其他考证结果不变(《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⑨《马氏南唐书》卷15《陈颙传》，四部丛刊本。

⑩《马氏南唐书》卷14《江为传》。

⑪《马氏南唐书》卷14《刘洞传》。

⑫《马氏南唐书》卷14《夏宝松传》。

⑬《江南野史》卷6《陈颙传》，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⑭《江南野史》卷9《刘洞传》。

⑮江为题诗白鹿寺，《江南野史》卷8《江为传》中记为题诗白鹿国庠。

⑯盛朗西先生《中国书院制度》所引庐山国学资料中，即有《马氏南唐书》之《江为传》，第13页；傅璇琮先生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周祖谟、贾晋华先生

所作的《江为传》的笺注以及陈尚君先生所作的补正,均将江为视作庐山国学生,分别参见第四册第501页,第五册495页;其他的还有樊克政《书院史话》(第13页)等。

①⑦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附录二《五代作家综合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系陈贶卒年于开宝八年(975),误。

①⑧《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补正》卷10《江为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494页。

①⑨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卷3《沿革》,朱瑞熙、孙家骅主编《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中华书局,1995年版,1083页。

②⑩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3《姓氏》,《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37页。

②⑪《马氏南唐书》卷23《黄载传》。

②⑫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3《姓氏志》,《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38页。

②⑬郑廷鹄:《白鹿洞志》卷3《名贤》“刘元亨”条、卷四《洞祠》“先贤祠祭礼”条,《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173、189页。

②⑭《江西通志》卷93《人物二十八》“刘元亨”条。

②⑮《马氏南唐书》卷23《朱弼传》。

②⑯李才栋:《刘元亨任教白鹿洞考》,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230页。

②⑰《马氏南唐书》卷15《毛炳传》。

②⑱《陆氏南唐书》卷7《毛炳传》。

②⑲《马氏南唐书》卷23《罗颖传》。

③⑩《江南余载》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③⑪《马氏南唐书》卷15《许坚传》。

③⑫《诗话总龟》卷46《隐逸门》、《神仙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439、444页。

③⑬《江南余载》卷下。

③⑭《江西通志》卷75《人物十》“李续”条。

③⑮陈建中:《南唐科举制度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7年硕士论文。

③⑯李征古:《庐江宴集记》,《全唐文》卷872,中华书局,1983年。

③⑰《庐山记》卷3,版本同⑦。

③⑧《马氏南唐书》卷23。

③⑨李中、刘钧参见李中《壬申岁承命之任浚阳再过庐山国学感旧寄刘钧明府》，《全唐诗》第21册，8546页，中华书局，1960年。

④⑩《武夷新集》卷11《杨徽之行状》，版本同⑦。

④⑪《江南野史》卷8《孟贯传》。

④⑫《公是集》卷51《先祖磨勘府君家传》。

④⑬《马氏南唐书》卷14《伍乔传》。

④⑭《马氏南唐书》卷22《卢绛传》。

④⑮《马氏南唐书》卷23《蒯鰲传》。

④⑯《马氏南唐书》卷22《卢绛传》。

④⑰《江西通志》卷75《人物十》“何昼”条。

④⑱段鹄等三人参见郑廷鹄：《白鹿洞志》卷3《名贤》“段鹄”条，朱瑞熙、孙家骅主编《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174页。

④⑲《马氏南唐书》卷23《孟宾于传》。

⑤⑩《武夷新集》卷11《杨徽之行状》。

⑤⑪《晦庵集》卷1《白鹿洞赋》，版本同⑦。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